

帕特南和被浪漫化的市民社会

吕 磊

内容提要 继承托克维尔的传统,帕特南把数量众多和活跃健康的市民社会视为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条件。帕特南的理论受到经验研究的挑战,但它的最关键的缺失在于把市民社会视为规范范畴而非分析工具。

关键词 市民社会 民主 社会资本 帕特南

市民社会这个古老概念的复兴,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和21世纪最初几年显见的事实。在中东欧的知识分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使用这个概念表达其政治诉求时,西方除了少数左翼学者外,大多数学者并不用这个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对市民社会原抱以极高期望的前苏东国家媒体和学术界很快就表达了对市民社会的深深失望^①;而在西方,主流学界开始一窝蜂地使用市民社会作为新的分析工具,并将市民社会观念奉为“破解社会秩序之谜的钥匙”^②。在这股市民社会复兴的学术大潮中,以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和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科学家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深信托克维尔对杰克逊时代美国民主的洞察,深信美国人的结社精神是美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并进而推定强健的市民社会总是能维持民主并促进民主的质量。然而,对市民社会的历史研究和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深入研究都表明,市民社会和民主的关系事实上非常复杂。帕特南等人实际上将市民社会浪漫化了,这种浪漫化意味着对市民社会的规范性期望干扰甚至扭曲了对市民社会现实的分析。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市民社会和民主的关系,其中首先要把市民社会当作中立意义的分析范畴。

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论美国的民主》到《旧制度和大革命》,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及相关的贵族时代和民主时代、贵族人和民主人)是他思考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范畴。这是他和同时代其他法国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所在。^③托克维尔虽为贵族,却意识到民主的潮流不可抵抗。作为洞察人类心灵的大师,他认识到民主通过对民主社会中人们心灵的某些负面影响——如个人主义和唯物质主义——将可能导致新专制主义(包括多数的暴政和温和专制两种变体),从而威胁他最钟爱的自由。传统社会中能够抗衡专制的那些“中间结构”(即孟德斯鸠认为的在君主制下仍能为自由留下空间的力量),又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被极大地削弱了。民主的时代怎么维护自由呢?美国是怎样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主又保护了自由?托克维尔认为,其中的秘密部分在于美国存在强健活跃的市民社会。由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自愿性社团组成的市民社会不仅构成了暴政的障碍,还滋养了那些有助于民主政治生活之健康和保持整个共同体凝聚力的民主人的“心灵习性”:人们不仅关心小我,也关心大我;人们具有自治的体验并形成了自治的习惯。他写道,在民主国家,“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④

在政治思想史上,托克维尔为市民社会和民主的联

自二战期间特别是战后托克维尔在美国复兴以来^⑤,市民社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几乎周期性地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讨论的热点。从50年代的大众社会理论到80年代因为贝拉(Robert Bellah)等人所著《心灵的习性》引发的激烈争论中,托克维尔的追随者们以不同的方式重申:现代民主(对于部分学者来说,还要加上资本主义)导致过度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的过度又将导致大众政治的危险(如暴民统治和多数暴政);由结社、共同体和社会网络滋养的社会团结意识可以抗衡原子式个人主义和大众政治趋向。

90年代以来,随着市民社会在西方的复兴,托克维尔热也达到了新的顶峰。托克维尔对市民社会重要性的判断使当代的许多学者深有同感。所以我们读到,如果没有政治社团的话,“中央权力机构的控制者将能够完全主宰社会”^⑥。市民社会不仅“设定了国家行动的界限”^⑦,而且还能够成为制衡和“深深穿透于”国家权力的“一种力量,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的状态”^⑧。另一些人则说,市民社会是好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基础。按照这种看法,市民社会能够让国家了解公民的真实需要,为政府提供了更多、更可靠的信息,从而在“解决成功治理的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将市民社会和好政府联系起来,是因为许多人相信市民社团能够对其成员产生有益的影响。市民社会常常被认为是培训民主公民的学校,就此而言,市民社会潜在的民主功能不仅体现在公共领域和制度层面上,还培养了个人的民主能力与诸如宽容、信任、尊重他人之类的公民美德^⑨。

二

与上述学者相比,帕特南等人的核心主张并不新鲜。其特别之处在于,这批社会科学家更明确、更肯定地断言,市民社会总是有利于民主。

1993年,帕特南出版了《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在这本研究意大利地方政府的著作中,他将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和托克维尔的洞见结合起来,断言结社生活的活跃程度将通过促进社会信任并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决定性地影响民主的制度绩效和健康:

“公民社团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内部’效应,而且它们对更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外部’效应。从内部效应上看,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从外部效应上看,大量的二级社团组成

的密集网络增进了‘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增进了有效的社会合作。”

在帕特南看来,这足以解释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地区政府的制度绩效差异:北部的结社活动更为活跃、存在着更为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公共精神水平更高;而南方则相反。什么使民主运转起来?帕特南回答说:“托克维尔是对的,当存在强健的市民社会时,民主政治会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⑩

1995年,帕特南又将眼光从意大利转向了美国,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参与市民组织能够促进互惠的规范、社会信任和合作从而解决集体行动的两难;能够“将参与者的自我意识从‘我’扩大成‘我们’”。他还“独自打保龄”为喻,形象地描绘了一幅美国暗淡的公民参与图景:打保龄球的美国人比过去多,参与保龄球联盟的人却比过去少得多。在帕特南看来,保龄球联盟成员人数的下降不过是美国结社生活“衰落”的冰山一角,他收集到的数据让他深信大多数自愿性社团的成员数量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呈下降趋势;这和其他证据(不愿参与选举投票、参与公共集会次数的下降、对政府信心的下降)一起表明,美国的公民参与、社会资本出现了广泛且持久的衰落。^⑪

在拉里·戴恭德笔下,市民社会有助于“民主的发展、深化和巩固”,因为它“为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了基础,……在激发政治参与方面补足了政党的作用,……提升了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效力和技能,……教育了民主社会的大众,……构造了政党之外的可以表达、汇聚和代表利益的多种渠道,……使无能力者有力量去促进他们的利益,……产生了广泛的交叉利益从而可以缓和政治冲突的极化,……招募并训练了新的政治领导人,……发展出调解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使公民尊敬国家并积极参与、关心国家事务”等等。他因此得出如下结论:“民主,特别是健康的自由民主,需要为了民主而被组织起来的公众。这样的公众已吸收了民主的规范和价值,他们不仅致力于自身的狭隘利益,还献身于更广大的、共同的公民目标。而这样的公众只有在强健活跃的市民社会中才可能出现。”^⑫

市民社会既具有如此积极且强有力的作用,市民社会的虚弱便十分危险。一位关心民主在新民主国家前景的学者声称,成功的民主化“只有在市民社会或某种类类似于市民社会的存在转变之前已存在或在转变过程中得以建立”时才是可能的^⑬,因此,该领域的学者和决策者

都认为在新民主国家建立市民社团是最紧迫的需要。美国的多数国际发展援助组织也将市民社会当成政治万灵丹兜售给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美国国际发展署、民主基金会这样的官方机构和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都将促进市民社会作为推行民主的首选项目。整个90年代,美国国际发展署用于市民社会项目的开支连年增长,1991年为5610万美元,1993猛增至1.18亿美元,1995和1998年分别为1.6亿和1.8亿。^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官方与民间组织的上述举措完全受学界新风的影响。在帕特南的相关著作出版之前,美国的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已经着手在东欧的“建立民主”项目。只不过当时他们对市民社会和民主关系的假设非常粗糙,而帕特南和其他的新托克维尔派则提供了更为严密的论断,精确地描绘了活跃的社团和公民参与是如何为民主政体做出贡献的。

三

强健的市民社会确保民主,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思想(*tempting thought*)^⑮。那么,又该如何来衡量市民社会是否强健呢?帕特南等人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标准:结社生活的活跃程度和结社生活的质量。

对帕特南来说,市民社会的力量首要在于社团的密度,因为社团的密度反映了结社精神,而结社精神促进了公民参与、增加了社会资本。因此,市民社会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于结社生活的活跃以及加入社团对于个人价值观与技能的影响。对戴蒙德等民主化理论家来说,市民社会之促进民主的巩固还在于倡议团体有能力制衡国家、阻止国家滥用权力。在这里,市民社会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市民社会组织对于国家和社会施加的杠杆作用。相应地,帕特南关注诸如唱诗班或保龄球联盟之类的次级社团(*secondary association*),戴蒙德偏爱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全国性组织和社会运动,比如妇女团体、人权组织和工会等。

结社生活的活跃果真有利于民主吗?

伯曼(Sheri Berman)曾写过一篇被许多人戏称为“和希特勒一起打保龄”的文章,分析了市民社会在魏玛德国的作用。魏玛时期德国的结社生活异乎寻常地活跃,单以社团的密度而论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然而,活跃的市民社会不仅没能防止反而助成了魏玛民主的崩溃,密集的社团网络有助于纳粹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治机器。伯曼因此不无道理地说,“如果德国的市民社会更薄

弱一点的话,纳粹就不能吸引那么多德国公民参与他们的事业,或不能那么迅速地击败其对手。”^⑯结社的活跃不仅助成了德国纳粹政权的兴起,还促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大量证据显示,意大利法西斯运动最先产生于中北部,并且由于该地区发达的结社活动而发展迅速;而在帕特南所说的公共精神水平较低的意大利南方,法西斯运动起步既晚、发展又慢。^⑰伯米奥(Nancy Bermeo)和诺德(Philip Nord)等人对市民社会在19世纪欧洲多国——既包括没能建立起持久民主的国家,葡萄牙、俄罗斯、意大利和德国;也包括建立起持久民主的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民主化历程中作用的研究同样表明,在确定市民社会是否有利于民主时,首先被排除在外的就是结社生活的密度。俄罗斯和葡萄牙的例子固然证明了软弱的市民社会和威权主义的直接关联,但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证明社团远非完美。^⑱

再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产生的两个新民主国家——巴西和西班牙——为例。巴西市民社会的活跃在新民主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能与之匹敌(巴西拥有中等收入国家中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而且自7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觉醒的市民社会在巴西向民主转变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但和戴蒙德的假设相反,巴西市民社会的扩展并没能降低国家对权力的滥用;高水平的结社活动也没能促使巴西民众更支持民主,在伊比利亚—拉丁国家中,巴西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是最低的。^⑲西班牙的状况则和巴西截然相反。在历史上,西班牙的市民社会发展一向不足。福山曾指出,“过分的个人主义、狭小的信任半径和家庭的核心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的特征”结果就是“强大的家庭、强大的国家以及中间组织的几乎不存在。”^⑳从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开始向民主转变直至今日,其市民社会根本谈不上强大,缺乏帕特南等人所说的有利于产生社会资本的那些条件,特别是缺乏高水平的公民参与,无论是活跃的结社生活,还是兴旺的社会运动,亦或高度制度化的倡议团体。按照帕特南等人的根本假设——繁盛的市民社会是成功民主化的基本因素,西班牙的民主化即便不是不可能的,其民主巩固的前景至少也是极端黯淡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民主。30多年后的今天,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尽管对于稳固的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意见不一,但都公认西班牙的民主是完全稳固的,承认在新民主国家中,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就无可匹敌。^㉑

显然,活跃的结社生活既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也会导致消极结果。毋庸置疑,在很多情况下,参与市民社会

组织可以克服现代社会个人的原子化和冷漠感,这些组织也的确能够促进集体行动并且创造重要的社会技能和社会联系。帕特南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是正确的,其错误在于假设集体活动和技能本身就是好的,而不考虑其指向的目标。市民社会的活动不仅能生产社会资本,也可能生产“非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被用来促进民主,同样也可以用来损害甚至颠覆民主。帕特南等人同样正确地认识到,健康的民主需要公民忠于整个共同体,需要公民对大共同体的利益有正确的意识,而其错误在于假设结社本身就能产生这些结果。在这里,帕特南等人的论断在逻辑上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加入社团对其成员的“内部”效应很容易就转变为对广大社会的“外部”效应。帕特南和福山都认为信任和加入社团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关系,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然而他们错误地认为个人之间的信任能很容易地就变成更为一般的社会信任。在这个问题上,当今最杰出、最深刻的市民社会理论家塞利格曼(Adam B. Seligman)告诉我们,因为不同团体的利益差异和经常出现的冲突,对这种转变不能那么乐观。^②很明显,帕特南等人错误地相信了利益的自然和谐。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并不仅仅是公民在市民结社领域内进行社会互动的产物,政治制度同样能产生社会资本。^③

看来单单以结社活动的活跃程度来衡量,并不能说明市民社会是否健康,更不能因此断言市民社会必然有利于民主。这就使引入结社生活的质量成为必要。

以结社生活的质量来衡量市民社会的目的是看市民社会本身是否健康,通常的做法是区分市民社会和不文明社会(uncivil society)。^④在多数情况下,学者们根据组织的目标和手段来界定所谓的不文明社会,这个范畴就包括使用暴力实现其目标的组织或反民主或极端主义团体。^⑤

也有人用组织的内部特征来界定不文明社会,认为只有按照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团体(横向组织的、非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才属于真正的市民社会。实际上,这正是帕特南整个论断的基础,当他说活跃的结社生活标志着市民社会的强健、而强健的市民社会有利于民主时,他头脑中浮现的社团正是这样的亲民主社团。按照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提出的标准,判断一组织是否属于市民社会主要看其成员之间存在的联系是垂直的还是横向的。据此,帕特南将所有在他看来属于以垂直联系为基础的组织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这里面既包括等级制的意大利天主教会,也包括以传统庇护—附庸制为

基础的意大利黑手党。^⑥戴蒙德用来区分的标准更为全面,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强健的市民社会:第一,不能包括具有反民主目标和方法的、不愿意妥协的利益团体;第二,其组织特别是经济利益团体的制度化水平要高;第三,其组织内部应当是民主的(从决策、领导人选举、负责性和透明度各方面看)。^⑦

这种区分看起来很清楚,在抽象意义上听起来也可能非常合理,但实际上非常成问题。首先,在实践当中,常常很难确定一个团体是横向还是垂直组织起来的。即便容易确定,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垂直组织起来的团体排斥在真正的市民社会之外,男童军(The Boy Scouts)是等级制的,而美国的那些民兵组织则是横向组织起来的。按照帕特南的标准,前者不属于市民社会,而后者属于市民社会。还有当帕特南断然将意大利教会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时,这位托克维尔的追随者似乎忘了参与宗教生活和社团正是在美国最常受到赞扬的市民社会活动,而这种赞扬恰恰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那里。帕特南自己恐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区分,因为在他对美国结社发展的历史研究中,男童军和教会组织都是被列入市民社会的。^⑧

其次,无论从组织的目标还是内部性质来看,都很难先入为主地确定某一组织必然地亲民主亦或相反,因而很难被明确地归为市民社会还是非市民社会。这是因为它们的目标和行动受到其环境的很大影响,有时其性质还会改变。魏玛德国时期,大多数德国人所属的职业和文化团体按照帕特南等人的划分,显然属于亲民主的市民社会组织。然而在纳粹兴起的进程中,这些团体却转向反民主,从而使纳粹能够利用诸如歌唱团体和观鸟俱乐部(帕特南最钟爱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最终接管德国社会。

四

到这里,我们已然可以发现,帕特南等人论断中最为根本、最为深层的一个缺陷:他们的实证研究表面上将市民社会作为中立的分析范畴,但他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实质上是规范性的,“非市民的”就是坏的、反民主的,而市民社会本质上是好的、有利于民主的。这一缺陷使得他们对市民社会的规范性期望干扰甚至扭曲了对市民社会现实的分析,并且由于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市民社会有利于民主,讨论市民社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塞利格曼提醒我们,市民社会观念的高度规范性特征是一种危险的趋势^⑨,帕特南们对市民社会

貌似中立、实则规范的运用就完全展示了这种危险。从理论上说,它会使得中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失去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在实践当中,对市民社会抱有过高的期望只会导致更大的失望。

这一基本缺陷还导致帕特南等人另一个根本的错误:将市民社会与其更广泛的环境割裂开来。在此,我们只需指出他们论断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完全忽略了政治制度或国家在塑造市民社会组织的性质、塑造整个市民社会内部的组织均衡以及在民主化过程中重要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多年以前的亨廷顿和今天的新托克维尔派一样,希望去理解什么创造了政治稳定、共同体感、愿意且能够妥协并合作实现集体目标的公民。简言之,他希望理解一个“文明政体”(civil polity)背后的东西。不过,亨廷顿认为答案不在于市民社会,而在于政治制度:

“粗略地说,复杂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自身政治机构的力量和广度。这些机构是道德和谐和互惠互利原则的行为性表现。相对而言,孤立的家庭、宗族、部落或村社,可能会通过不那么自觉的努力就建立起共同体。……随着社会成员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活动越发多样化,要想建立并维系一个高水平的共同体就更需依赖于政治机构。……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③

以这种观点看,一个社会越复杂、越多样,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制度,这个强大的政治制度能够聚合具有多样利益的人们、将他们动员起来服务于社会而非个人的目标。显然亨廷顿对于利益的自然和谐不像新托克维尔派那样有信心,他认识到市民社会这个领域仍然保持着和公民多样的特殊利益的联系。当然,亨廷顿关注的是发展中社会,因为在那里政治差距看起来非常之大:面临的挑战如此之高,而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如此之低。^④但正如伯曼指出的,从理论上说,这样一种差距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冲突水平增强、面临的问题变多,而政治制度又没有及时处理这些变化,政治挫折感甚至政治不稳定就会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市民社会只能激化而非缓解问题。市民社会活动将无法创造该社会所需要的民族共同体感或对公共利益的诉求;相反通过集合不满的个人,结社活动可能会加深社会分裂并为反对派运动提供一个基地。^⑤想想亨廷顿对“腐朽政体”(uncivic polity)的界定吧!公民是高度活跃

的、被动员起来的,而政治制度是虚弱的、没有反应能力的!

市民社会活动产生社会资本还是非社会资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此。如果一国的政治制度能够疏导、解决不满,结社活动就支持政治稳定和民主。实际上,这才是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模式。如果政治制度是虚弱的,现存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是无效的、不合法的,对于不满的公民来说,市民社会的活动只会变成政治的替代,日益吸收他们的能量、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结社活动通过加深社会分裂、促进不满,从而损害政治稳定和民主。繁盛的市民社会标志着政府和制度的失败,标志着民主的疾病。这就是伯曼为我们描绘的魏玛德国民主崩溃的原因:软弱的政治制度不能对许多公民组织向其提出的要求做出反应,导致后者转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群体,最终转向纳粹党。^⑥

伯米奥和诺德的历史研究同样发现,衡量市民社会是否亲民主,最有力的解释因素是社团和国家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国家对社会多元性的容忍程度——主要通过议会建立和市民社会的联系——是决定性因素。伯米奥强调,这方面因素“决定了社会集团是否支持民主。社会集团的大众越感到远离……‘代议制’机构,代议制政府本身的基础就越薄弱。”^⑦

五

自早期现代的诞生直至当前的复兴,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中最明显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一个描述性范畴,也是一个规范性范畴。换言之,它在体现了社会价值的同时,也是处于不断变动环境中的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机构或制度。一方面,始于18世纪的英国,它被用来描绘一种新型社会——由日益增多的俱乐部和社团、咖啡馆和共济会所、公园和公共图书馆等构成的社会,人们作为独立个人(原则上和他的社会等级、信仰或职业无关)于其间自愿相聚并从事各种活动:阅读和谈话、交流思想或饮酒嬉闹、组织起来帮助其成员或服务于更大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它也表达了一种理想,在许多思想家那里,市民社会都代表着对更好社会的设想:这个社会不仅应当是不同于国家的、自我调节的,还意味着市民认同(civility)、宽容和和睦。恰如塞利格曼所言,市民社会观念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包含了社会秩序的道德理想,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即便不能消除至少也能协调个人利益要求和社会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⑧

然而,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在社会价值(如团

结) 和社会机构或制度的实践(竞争性的和宗派主义的) 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在这个意义上, 市民社会的现代历史的确是两者之间紧张的历史。^⑧ 因此, 当我们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去考察市民社会的现实时, 必须首先将之作为一个中立的范畴。我们会发现, 市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因为正是在市民社会这个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舞台上, 个人通过其自愿参加的社团形成集体意识和认同, 包括阶级认同^⑨。我们还会发现, 市民社会也是一个冲突性的领域。这个社会互动舞台上上演的戏剧固然有和谐的一面, 但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对抗和冲突, 不同社团、社会运动和阶级的利益要求绝不像帕特南等人想象的那样自然地和谐一致。

还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在分析中我们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还有市场、家庭和其他私人社会交往领域) 的自主领域, 但在现实当中, 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并非雷池, 市民社会和国家以及其他领域之间事实上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状况。市民社会对民主或民主化的影响不仅受其组成部分的强大和性质的影响, 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市民社会组织和其环境——尤其是国家或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从这个角度看, 那种抽象地认定加强市民社会及其组织就必然能加强民主的看法是有问题的。^⑩

- ①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10/3 (Autumn 2003) p. 1.
- ②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0.
- ③ 关于托克维尔思想的原创性, 见 Pierre Manent, "Democratic Man, Aristocratic Man and Man Simpl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27/2 (Spring 1998) pp. 79 - 84.
- 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董果良译, 商务印书馆, 1988年, 第216、640页。
- ⑤ 托克维尔在美国影响的历史, 见 Robert Nisbet, "Many Tocquevilles", *American Scholar*, 46/1 (Winter 1976 - Winter 1977) pp. 59 - 75; Cheryl B. Welch, *De Tocquevil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0 - 228; Klaus J. Hansen, "Tocqueville: Frenchman for All Season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38/2 (Aug. 2003) pp. 295 - 305.
- ⑥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1 (Feb. 1994) p. 12.
- ⑦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 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 第33 - 34页。

- ⑧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 《国家与市民社会》, 第31页。
- ⑨ Mark E. Warren, *Democracy and Associ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0 - 77; Mark E. Warren, "What Kind of Civil Society is Best for Democracy?" *Portugu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1 (2004) pp. 37 - 47.
- ⑩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赖海榕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105 - 134、213 - 217页, 引语分别出自第102 - 103、214页。
- ⑪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Jan. 1995) pp. 65 - 78. 另见 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4 (Dec. 1995) pp. 1 - 20.
- ⑫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9 - 250, 221.
- ⑬ Victor Perez - Di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转引自 Nancy Bermeo, *Ordinary Peopl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Citizenry an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
- ⑭ Thomas Carothers, "Aiding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A Better Way?" *Problems of Post - Communism* 43/5 (Sep/Oct 1996) , pp. 15 - 24; and his "Democracy Without Illusions", *Foreign Affairs* 76/1 (Jan/Feb 1997) pp. 85 - 99.
- ⑮ Thomas Carothers, "Civil Society", *Foreign Policy*, 117 (Winter 1999/2000) p. 21.
- ⑯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49/3 (Apr. 1997) p. 402.
- ⑰ Hyeong - Ki Kwon, "Associations, Civic Norms and Democracy: Revisiting the Italian Case", *Theory and Society*, 33/2 (Apr 2004) , pp. 135 - 166; William L. Eubank and Leonard B. Weinberg,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within One Country: The Case of Italy", *Terrorism & Political Violence*, 9/1 (Spring 1997) pp. 98 - 108; Dylan Riley, "Civic Association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Interwar Europe: Italy and Sp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2 (Apr 2005) pp. 288 - 310.
- ⑱ Nancy Bermeo and Philip Nord, eds., *Civil Society Before Democracy: Lessons from Nineteenth -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and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
- ⑲ Omar G. Encarnación, "Tocqueville's Missionaries: Civil Society Advocacy and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World Policy Journal*, 17/1 (Spring 2000) pp. 12 - 15.
- ⑳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p. 56, 55.

- ⑳ Omar G. Encarnació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Spa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1 (Spring 2001) pp. 53 - 79; Omar G. Encarnación, "Spain after Franco: Lessons in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cy Journal*, 18/4 (Winter 2001/2002) pp. 35 - 44.
- ㉑ Adam B. Seligman, "Trust and Civil Society", Natalie Fenton, Leslie C. Hems, Andrew Passey and Fran Tonkiss, eds., *Trust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2000) pp. 12 - 30.
- ㉒ Wendy M. Rahn, John Brehm and Neil Carlson, "National Elections as Institutions for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 pp. 111 - 162.
- ㉓ John A. Booth and Patricia Bayer Richard,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apita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60/3 (Aug 1998) pp. 780 - 800; Ami Pedahzur and Leonard Weinberg, "Modern Europe Democracy and Its Enemies: The Threat of the Extreme Right", *Totalitarian Movements & Political Religions* 2/1 (Summer 2001) pp. 52 - 72; Ami Pedahzur, "The Potential Role of 'Pro -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in Responding to Extreme Right - Wing Challenges: the Case of Brandenburg", *Contemporary Politics* 9/1 (Mar2003) pp. 63 - 74.
- ㉔ Laurence Whitehead, "Bowling in the Bronx: The Uncivil Interstices betwee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4/1 (1997) pp. 94 - 114.
- ㉕ 《使民主运转起来》, 第 114 - 126、167 - 171 页。
- ㉖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pp. 228 - 229.
- ㉗ Gerald Gamm and Robert D. Putnam, "The Growth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America, 1840 - 194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4 (Spring 1999) pp. 511 - 557.
- ㉘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pp. 203 - 205.
- ㉙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等译, 三联书店, 1989 年, 第 10、23 页。
- ㉚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p. 569.
- ㉛ Ibid. pp. 569 - 570;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 ㉜ Nancy Bermeo and Philip Nord, *Civil Society Before Democracy*, p. 244.
- ㉝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p. x. 另见 Adam B. Seligma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ociety* 35/3 (Mar/Apr 1998) pp. 28 - 36.
- ㉞ Frank Trentmann, "Introduction", in Frank Trentmann ed., *Paradoxes of Civil Society: New Perspectives on Modern German and British His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 2000) p. 3.
- ㉟ 西方史学界对市民社会的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社团和市民社会经历对于阶级意识特别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形成的重要性。一位著名的思想史家曾指出, 18 世纪下半叶满布于英格兰的形形色色的地方 (provincial) 社团是激进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孕育之所。正是在这里, "资本家、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商人、政治活动家和反国教派人士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 导致了团结感和阶级意识"。Isaac Kramnick, "English Middle - Class Radicalism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Literature of Liberty* 3/2 (Summer 1980) pp. 40 - 42。由于篇幅的限制, 这里无法详细评述西方史学界对市民社会的已有研究, 尽管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市民社会和民主的关系非常有帮助。

作者简介: 吕磊, 历史学博士, 南京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 任连博)